

信任主题：中日关系与亚太地区的未来

牟文富 李江

历史上的相互隔绝

在亚太地区中,中国和日本是东部亚洲中重要的两个国家。历史上,中国文明对日本具有深远的影响,日本的语言、衣食住行和人际关系无不由中国早期文明塑造成型。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与日本的相同点非常多。相反,研究日本的人类学家,例如本尼迪克特(Benedict),发现日本是太独特了。即便是中国人对日本文明这个自己文明的养子也感到无比的陌生,要沟通却非常困难。

假设唐朝一个有相当文化素养的人到同时代的日本去,他会发现自己所在环境很熟悉,从建筑到饮食,从服装到个人气质,从书面语言到文化圈子中的爱好,都是如此。如是在11世纪去,他甚至会发现当时日本的知识阶层都喜欢白居易的诗歌,差不多能出口背诵。如果这位唐朝人到今天的日本,并抱着考察异国风土人情这种心态的话,他还是会发现许多较为熟悉的东西,尽管不是非常明显,例如京都的古建筑,传统的和服,或许还有那种微妙的人际关系,等等。上述假设只不过说明,中国文明对日本的影响很深。但是,这种影响仅仅是当时中国在东亚处于文明的中心地带,而日本处于边缘地带时发生的,因为边缘地带的国家总是从中心地带吸收很多的东西。更加需要注意的是,当时文明的传播是单向的,日本从中国学到的东西实在太多。但是,至于日本当时通过这种学习形成了怎样一种中国观念,现

在还不是十分清楚。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知道和了解日本的人是非常的少。即使在唐朝,仅仅是同日本遣唐使和在日本做官的人有接触的中国士人对日本有一知半解的知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日本人在历史上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也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总之,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一衣带水的国家在地理上是如此的近,而在想象中又是如此的遥远。

或许,是双方的傲慢阻碍了很早就应该进行的了解。对中国的世界观念而言,有什么必要去了解“遥远”的蛮夷呢?对日本而言,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东亚各国之间的关系仅仅是一种朝贡关系。日本人并非不明白日本同中国不是在同一位置上,据说内心自卑在外部的表现是一种很明显的高傲。这就是中国和日本在历史长河中的关系状况。

相遇过程的残暴性

如果从广义上理解相遇和交流这种概念,那么战争也可以包括在内。在最近的500年中,中国同日本打过交道,比如倭寇对中国东南沿海的入侵,丰臣秀吉对朝鲜的入侵而导致中国出兵支援朝鲜。如果历史因素有遗传功能的话,那么丰臣秀吉对中国和朝鲜的野心就是早期的基因了。

经过几千年的隔绝,中国和日本真正需要了解和交流的时候,这种了解和交流的形式却是以历史性的悲剧开始——日本对中国发动了残暴的侵略战争。是不是一种人类集

团和另一种集团经过长时期的隔绝之后在相遇时总是有战争伴随呢?英国和法国在历史的早期有百年战争,中国同西方相遇时有西方对中国长期的侵略战争,西方到美洲的时候有对印第安人的屠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所受的最深的苦难之一。这个时候中国人民对日本的认识是一个侵略者的形象。

在明治维新前后,日本思想界、学术界和政治界的精英人物努力学习西方,他们所了解的西方和东方之间的对比是非常的鲜明,在接受了进步、进化、发展等观念之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就成了落后之地,更进一步,他们将其视为一个供人征服、奴役的地方,供日本发扬国威、实现其褊狭民族野心的场所。结果是什么呢?是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是日本军国主义对日本人民的病态性误导,是东亚其他国家深受战争之苦,是日本几乎临近毁灭的边缘。

即便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和日本之间也没有进行很好交流和了解的机会。由于日本被美国拉入了冷战的轨道,所有应该被清算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因素在美国的庇护之下而没有被清算,相反,若干同这些因素有牵连的人物掌握着战后日本的政权,他们的所作所为给日本的基本政策定下了基调。这种基调没有同过去彻底决裂,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中国和日本关系的独特之处就在此。如此临近的两个国家在接近两千年来的历史中还没有愉快地接受对方,而世界已经进入一个高度相互依存的时代了。欧洲仅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才变得和谐,才排除了战争的可能性。可是对中国和日本所处的东亚来说,时间并不是很充足。如果两国关系充满着难以名状的因素,相互依存肯定是相当脆弱的。

很难准确地描述中国和日本关系的现状。较为明显的具体问题:①日本对历史上

的侵略战争缺乏真正而足够的认识;②包括钓鱼岛在内的领土和领海及大陆架争端;③日美军事同盟的效力范围和台湾因素。对第一点而言,自从1949年之后就一直存在,中国对此的批评语气之强弱随日本的政治言论起伏而变化。对第二点和第三点,领土争端并不仅是中日之间的特殊情况,它应该适应世界所有领土争端的情况。日美同盟针对中国及台湾问题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并未明朗化。总的来说,中日关系并没有严重的重大事件使两国必将走向对抗的地步。在这种难以名状的关系背后,有一种历史的情结,它确实是日本那种荒唐的历史观所造成的,也表示了中国对日本的不信任。

信任问题及其价值

中国和日本之间缺乏和解,因而缺乏信任,这是问题的关键。和解的先决条件在于日本对过去的侵略战争负责。只有痛下决心,表明同过去的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彻底决裂,才能证明自己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国家。尽管可以认为亡羊补牢未为晚,但实际上日本已经丧失了很好的机会了。真正应该对侵略战争负责的具体的已经不存在了,战后日本政府中同过去有牵连的人也没有领导国民对过去做认真的反思,所以现在的日本政治家和普通国民已经对过去的侵略战争发生了健忘症。今后或许也难得有机会看到日本真正有远见的政治家能进行这样的工作。

国家之间的信任太重要了。很少有人会相信加拿大同美国会发生边界冲突,或某一天两国处于激烈的武装冲突,爆发大规模的战争直至宣布处于战争状态。法国同德国在历史上就是一对仇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两个国家和解了,双方都放弃了对对方的领土要求和历史上存在的帝国野心,将国力倾注于发展人民的福利上。欧洲共同体的各个国家相互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

了。当然,西欧国家之间的信任、和平是长期历史中各个国家多次博弈的结果,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产物,是从历史经验中产生的具有安全功能制度的表现。尽管东亚同欧洲不一样,但历史经验不是可以给我们启迪吗?

东亚国家是世界上异质性最强的地区之一。虽然学者在论述什么东亚儒家文化,但国家之间的关系现在难说基本上是和諧的。儒家文化并没有给东亚国家带来什么共识和一致性。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一种统摄东亚各国价值观念的儒家文化。相反,现在各个国家的政治家和学者正在探讨东亚(或亚太地区)一致的可能性。^①中国、日本、俄罗斯、朝鲜、韩国、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缅甸、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等国家是亚洲太平洋地区国家体系中的主要行动者,这些国家之间的差异(最后4个国家的关系当除外)就如同黑白那样分明。历史的恩怨、领土争端和国家之间争当旗手和榜样这些因素时时困扰着上述国家。这些国家中倒也没有明显的具有爆炸性和极度危险的因子存在,但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气氛笼罩着这些国家,这就是猜疑和不信任。

信任被社会学家视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是维系社会关系稳定的重要支柱。^②信任也被用来解释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经济成长或发展规模经济的决定性因素。^③那么在国际社会中信任有什么用处呢?可以减少国家间交往的成本。法国不用再花费巨资修建马其诺防线,英国、法国和德国不用专门为了防御对方而维持巨大的军事力量,美国和加拿大不用在漫长的边界上维持庞大的军队。中国和俄罗斯及中亚国家在最近建立的信任措施也有助于朝这个方向迈进(这些国家的疆界离一个和平的疆界还非常遥远),但日本和中国,朝鲜和韩国,越南和中国,印度和中国,美国和中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和日本,等等,就没有做些什么建立有效的信

任措施。这么多而又如此重要的国家之间缺乏信任,国家间交往的成本不会很低,关系也不会很融洽,合作的深度和广度都达不到人们所期待的水平。

目前我们所期待的国际制度,以及信任,或许不是人们有意识地理性设计的产物,而是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秩序的扩展,是人类历史经验的产物。^④启蒙时代的世界政府构想和20世纪的国际联盟所带的人为因素太多,所以前者从未出现,后者失败了。联合国和欧洲共同体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予了人们足够的经验的结果。亚太地区并非没有战争之类的痛苦经验,但应该牢记的是我们所需要的并非总是战争经验。人类所具有的学习能力可以使我们或许能够跳跃痛苦阶段,这就是发挥我们能动作用的必要性。

一山二虎的问题

在历史上中国基本上总是处于强大的一方,日本以岛国之优势,对中国敬而远之,也并非没有非分的想法,但丰臣秀吉对中国和朝鲜的挑战还是中国处于强盛的时候,所以他的失败并不怎么偶然。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变得愈来愈强盛的时候,中国却陷入了急剧衰落的深渊。在这个时候,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正进入了高潮。目前,日本仍然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强国,同时中国的发展也为世界所瞩目,即便是最保守的估计,中国的强大也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必将再次屹立在东方。所以有人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从来没有同时强大过,而现在却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这两个国家应该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呢?据说对中国“深深的疑惧在今天的日本正在滋生”,因此两国要“进行公开直接的对话还需要一段时间”。^⑤

美国的布热津斯基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中国发展的成功意味着中国将首先发挥一个

地区强国的作用,进而具有全球性的影响。日本在亚洲在政治上是孤立的,它虽然地处亚洲,“却不能安然自在地成为一个亚洲国家,这种情况大大地限制了日本在地缘战略上的选择”,^⑤日本“争取成为地区性主导大国的目标根本行不通,而在没有地区基础的情况下要成为真正全面的全球性大国又不现实”,因此,日本最好放弃地区强国的任何愿望,而立足于同美国的军事同盟,着意地在全球范围内去发挥它的影响。^⑦在布热津斯基看来,中国和日本“双方互不信任,也都不准备接受对方的地区领导地位”,^⑧所以他给中国和日本设计了两种不同方向的选择,使两个国家不迎头相撞。

从某种程度上说,布热津斯基的设计也是在逃避问题。中国和日本必将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负有重大而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两国关系却充满猜疑和缺乏信任。日本越是脱离亚洲,它就只能依靠美国;它越是依靠美日军事同盟,它就必将脱离亚洲。同亚洲邻国的疏远必将使亚洲对日本更加陌生。日本出于自己的愿望同亚洲各国的合作,和日本立足于日美军事同盟而同亚洲合作,肯定不是同一回事。

亚洲的未来

目前,中国、美国和日本在东亚组成的三角关系很特殊。中国和日本同美国的关系远比日本同中国的关系近。但在亚太地区,这种关系不足以使该地区未来的和平与发展得以顺利进行。下面是一些中国和日本及美国在未来要面对的问题,只要日本和中国不能就历史问题达成和解并取得双方的信任,那么这些问题就很难处理。^①“中国人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残酷暴行和日本人没有充分和公开讨论这些暴行仍然耿耿于怀,而日本人感到他们已经一再道歉”,^②这需要日本充分而全面的合作才能解决这个

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是中国和日本取得和解的最重要步骤。^②建立健全的地区性的以及国际经济结构,在波及全世界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个问题尤其显得具有紧迫感。

^③台湾同中国大陆的统一问题,虽然这个问题应该是一个内政问题,但美国因素以及日美军事同盟在地理范围上包括台湾这种可能性会使这个问题复杂化和国际化。“只要台湾问题一天不解决,亚太安全形势总有一个不稳定的因素”。^④东亚在未来仍然是一个在经济上极具活力的地区,作为世界上第二大资本主义国家,日本仍然是该地区最主要的资本和技术来源国之一,所以日本同未来该地区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⑤日本在世界上的影响主要是经济方面,其政治上的影响非常有限,而中国可能正好相反,如果两国能进行合作,这对双方仍至整个地区都有好处。

如果说日本和中国两国的关系处于一种永恒的猜疑和不信任中,那应该说是低估了人类理性的作用。目前的这种关系只是一种历史情结,而不是什么具有爆炸性的问题。即便是中国人民觉得日本某些政治家的言论是极端的不负责任和不可理喻,但也很少有人认为日本再会将“八紘一宇”的神话当作真实的国策,或中国海军在黄海上遭受日本海军的精心伏击,或日本在中国东北成立一个“伪满洲国”,或日本再会进军南京实施大屠杀。可是,上述悲剧毕竟实实在在地发生过,然后中国人又听日本有人说事情没有发生,或即便发生了,那也是为了“解放”的目的,为了大东亚的“共荣”,这就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历史上的结就难以解开了。在目前国际环境中,合作成功的条件不在于认为对方不会干什么,而在于相信合作伙伴可能干什么。这就是本文要说的,中国和日本两国信任关系的巨大力量之所在。

(作者单位: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上海理工大学)

注释:

① 参见马赫布巴尼,《亚太的一致》,宋雅浪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8年第3期。

② 参见J. 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336-340页。

③ 这是弗兰西斯·福山在《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尽力发挥的主题。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年。

④ 参见F·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

店,1997年,第33-36页。

⑤ 同①。

⑥ 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1页。

⑦ 同上,第240页。

⑧ 同上,第230页。

⑨ 傅高义,《美中日三角关系及面临的问题》,《参考消息》,1998年9月23日。

⑩ 潘振强,《光明日报》,1998年6月17日。

(上接第54页)

3个月后,一年期的利率从11.50%下跌到了10.50%,实际的合约价格为89.50,买入的合约有0.50差价的利润,折算成实际利率收益为11%。

若3个月后实际利率比原先预计的11%还高出0.50%,则合约价格将跌至88.50,每一份合约亏损1250美元,但因利率维持11.5%,此笔多头套期保值后的收益率仍然相当于原设定的11.00%。

从上例不难发现,通过多头套期保值确立固定的收益率必须以下列条件为前提:

(1) 期货合约交割日与资金流入的时间完全相匹配。

(2) 尽可能正确预测潜在的现货市场是如何变化的,特别是与自身的投资收益密切相关的利率变化。

通过利率期货的套期保值,人们可以规避利率波动对实际收益影响的风险。

(作者单位:上海对外贸易学院)